

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

陈 翰 笙

第一个英国人到印度的是湯麦斯·史蒂文斯，他在1579年赴果阿，去当天主教傳教士。过了三十三年以后，英国商人始在苏拉特建立东印度公司。从那时起英国海軍不但遏制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人在海上的势力，并且到1757年英国在印度战败了法国。此后莫臥兒王朝就逐漸向英东印度公司低头。

英人在印度战胜法人的一百周年时，印度人大起抗英。在这大起义前七十餘年内，英人确已統治了印度大部分地方；而当这大起义失败时，曾經統治印度三百三十年的莫臥兒王朝也就灭亡了。英国駐印的第一任总督赫斯丁斯在1750年到达加尔各答；三十多年以后他就說，英国在印度几个省份內的統治权已无法可以隱蔽^①。到了1813年，駐帝俄的英国大使格蘭維爾伯爵更說，英国王室已成为实际統治印度的权力。从那年起，东印度公司的权威逐漸下降；而英国議院的权威在印度逐漸增長。从那年起，英国的工業資本开始投放到印度^②。但拥有商業壟斷資本的东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才解体。我們可以說，随着抗英大起义的失败，不仅莫臥兒王朝灭亡了，东印度公司也就此結束。

这个划时代的抗英大起义，比过去 1764, 1806, 1816, 1824, 1831, 1844, 1847, 1849, 1851, 1852, 1853, 1855年各地的起义規模大得多。大起义的那年印度人口約有二亿左右，每六百八十餘人中就有一个武装兵士。但那年的印度兵士虽从233,000人增加到257,000人，駐印的英国兵士却从45,000人減至36,000人^③。这样，印兵和英兵的比例从五比一上升到七比一。据一位英国在印度的武官說，当时英兵减少并非構成大起义的原因，但他以为如果英兵能增加20,000人的話印度人还不敢起义^④。在大起义以后，在东印度公司解散以后，英国的政策不仅是拉攏印度剩下來的土邦酋長，使他們一面效忠于英人同时也加紧剝削人民，并且把印度兵士减少而把英国駐軍增加到65,000人^⑤。

从維多利亞女王和駐印总督康宁伯爵的信札往来中，我們也就明白英国当时在印度增兵的政策。維多利亞女王在1857年六月二十九日写道：“英帝国在最

近二十年内已經加倍地擴張，但女王的部队还依然如往昔那样少”。她主張借印度大起义的机会扩大軍备。同年七月四日康宁和她写信說：“从印度情况看来，英国权威这次受到損害。如果要重新振作，恢复帝国的名望的話，非要在全体印度人面前摆出英国人的实力不可。要使印度人觉悟到反抗是无用的，才会有安全的保障”。

印度大起义爆发时，英、法、美、俄四国早在我共同策动1856至1861年的第二次鴉片战争。主持这一次对我侵略战争的是英国額尔金爵士。当他率兵东来于1857年六月三日路过新加坡时，他忽然收到康宁伯爵要求調兵援助的信。这样，原来要到中国参加侵略的一大部分兵力，就移到印度去鎮压印度人了。英軍在1856年十月二十三日开始进攻广州，因为兵力單薄直到次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英法联軍才攻入我广州市^⑥。英法联軍入广州时，印度大起义已經挫敗。因此法国的拿破崙第三不曾敢于乘隙侵英，而比利时要派一个分遣队到印度去援英和美利坚合众国要派五万名志願軍同样去援英，都被婉詞拒絕了^⑦。

当1857年五月印度大起义爆发时，对帝俄的克里米亞战争（其中英軍曾死亡二万五千）已經結束了將近八个月。从1856年十一月开始的英国侵略波斯的战

① Philip Woodruff, "The Men Who Ruled India", London, 1953, Vol. 1, p. 379.

② R. Mukherj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Berlin, 1955, p. 246.

③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Vol. 14, p. 446.

④ Woodruff, 前揭書, Vol. 1, p. 387.

⑤ A. L. Morton, "A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51, p. 469.

⑥ 夏燮：“粵民义师”，見“中西紀事”13卷。魏建猷：“第二次鴉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頁。季羨林：“試論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起因性質和影响”，見“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第32, 34頁。

⑦ "The Times", London, August 19, 1857.

爭，也在印度大起義爆發前兩月已經停止了（1857年三月四日英波和約在巴黎簽訂）。因此，倫敦泰晤士報說：“不久以前，印度的奧德省（即現時北方省）和平地歸并給東印度公司，西北方面的旁遮普省也已變為附庸。這次叛亂又幸而沒有在克里米亞戰爭或波斯戰爭時期同時發生。”^①英國基督教青年會創辦人之一，久在下議院做工人福利工作的夏夫斯伯利伯爵（1801—1885年）也曾說，印度大起義的時會太幸運了，“好像上帝在那里屈指計算的”^②。他的意思是那時英國有足夠的力量去鎮壓印度人民，起義是無效的。

我們再要看看，當時英國內部是個什麼局勢。從1836到1848年十餘年間，英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進行了要求用選舉票選出議員并要求實施無財產條件的成人男子選舉權。這是英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民權運動。法國1848年的革命給予英國社會很大的影響。恩格斯曾說過，“勝利的法國工人們的社會主義宣言和口號嚇倒了英國的中產階級，也瓦解了實事求是的英國工人運動。民權運動不等待1848年四月十日被壓倒，而它內部早就無形中崩潰了。從此工人階級的活動被衝到後面去，而資本家却長驅入勝”^③。

那時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而領導這個民權運動的是一位英人，名叫瓊斯（Ernest Charles Jones, 1819—1869年）。他父親曾任駐德的軍官，他自己出生於柏林并在德國受過教育。他是馬克思的好友，馬克思到倫敦後常和他往來，他們二人也有許多相同的見解^④。瓊斯於1848年四月十日率領三萬人到英國眾議院為改革憲法而請願。群眾當場被武裝警察所驅逐，瓊斯以叛國罪名被處徒刑三年。民權運動遂告中斷。當瓊斯在獄中時，他曾寫了幾篇文章反對英國統治印度。他在1851年聽到印度起義的消息，就用他自己指頭的血寫著一首詠史體的詩，題為“印度斯坦造反”。當時獄中無紙，他就從基督徒禱告本上撕下一頁來寫這首詩。出獄後，特別在印度1857年大起義時，他更寫了好些文章和做了許多演講來支援印度人民正義的抗英運動^⑤。

但當印度大起義爆發時，像瓊斯這樣同情的人已不多見，因為那時英國工人運動早已進入銷聲匿迹的時期。從1848到1868年那二十年內，英國的工商業獨霸於全世界，幾乎所向無敵。英國在海外剝削所得，足夠分給國內的工人階級。因此工人們生活有些提高而無意於革命運動。那個二十年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彷彿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十年中的美國（1945—1955年）。難怪馬克思在1858年曾帶著不甚高興的語氣寫道：“英國的無產者日愈走向資產階級，因

而在这个世界上資本主義最濃厚的國家就會出現一個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階級，一個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和一個資產階級本身。作為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來講，當然這是有幾分正當的道理的。”^⑥

儘管整個英國資產階級在那二十年內享受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印度的大起義還是震驚了它們。1857年七月十一日倫敦的泰晤士報有社評說：“目前銀行中的硬幣繼續不斷地增加而農產丰收又可預測，交易所衰退的現象几乎是空前的。然而比這些問題更使人焦急的，就是印度方面傳來的消息。萬一沒有好轉的希望，可能造成恐慌”。有些英國人明白印度大起義的真相，知道這一次決非什麼普通的兵變而是全民族的反抗。瓊斯在人民報（1857年八月一日）也發表過這樣意見^⑦。

印度大起義和東印度公司的積年累月的、兇惡殘酷的剝削是分不開的。十八世紀中叶，英法在印度利用他們已經占據的沿海基地和印度各邦分裂的局勢，在那里爭奪殖民地。英法兩國的東印度公司各代表著本國的商業壟斷資本，彼此干預印度土邦的內政，使土邦的領袖成為政治傀儡，又各自招募印度兵士建立雇佣軍隊。英法七年戰爭（1756—1763年）的結局才使英國獨霸於印度。1757年六月英方在普拉西打敗了法軍後，英東印度公司就在孟加拉征收田賦。從此這個公司不僅是一個商業上的權威進而成為一個擁有軍事和領土的權威。

英國當局在印度要農民把他們農產收入的55%納為田賦^⑧。東印度公司最後的二十四年內，印度對英國貿易的出超和公司向英政府上繳的稅款竟達一億五千二百萬金鎊。在1851年，僅上繳的稅款匯寄到倫敦的，就有六百二十萬金鎊^⑨。十九世紀中叶英國輪船公司募集資本在印度建築鐵道干綫，把英國工業品大量輸入內地，促使印度手工業崩潰，於是破產的人們愈來愈多。因此各地人民暴動的次數也增加，反抗的

① “The Times”, London, June 27, 30, 1857.

②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2, 1857.

③ “London Commonweal”, March 1, 1885.

④ Morton, 前揭書, p.435.

⑤ “People’s Paper”, London, May 7, 14, 21, 28; June 11, 18; July 2, 1853. “Ernest Jones: Chartist”, edited by John Saville.

⑥ Morton, 前揭書, p.441.

⑦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rnest Jones”, edited by John Saville.

⑧ Bombay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1872—73, p. 41.

⑨ R. Mukherjee, 前揭書, p.225.

情緒也再接再厉。終于1857年五月发动了大起义。时代急剧转变，不久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上升的先进的阶级成为下降的、衰落的、内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列宁在1908年写着一篇“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时，特别提到印度。他說：“英国管理印度的制度，是无限的暴力及搶掠底制度。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俄国当然是除外）如印度那样的民众穷困和連年飢饉的。……現在英国几种最有势力的报纸总是切齒痛罵那些破坏印度治安的‘鼓动家’。”①

但在列宁写这篇文章的五十年前，就是印度大起义时，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在印度和英国的商业垄断资本家（英东印度公司）搶夺地盤。他們之間在印度的內訌显然是英国工业化的一种結果。沒有近代的工业化，就不会有工业资本家的势力。英国的工业化是在普拉西战役后，十八世紀下半期完成的。我們应当知道，用煤炭去替代木材做工业燃料始于1760年；蒸气机器在1768年才完成；近代織布机器在1785年才发明于英国。但仅靠机器的发明而沒有工业市場，工业化就沒有希望。在那个时期，英国虽然失掉北美的殖民地，还有印度那样大的地方去实行资本主义的榨取②。英国在印度所进行的剝削，无疑地促成了英国的工业化。美国一位早期的、有名的經濟史家阿达姆斯就說过，英国工业的进展在1694到1757年（普拉西战役）时期较为迟緩，而在1760到1815年时期则有飞速奔放的現象③。

英国工业资本家們对英国商业资本家所給予他們的帮助还不滿足，他們更要进而夺取印度市場并在印度投資。他們打击商业垄断资本的东印度公司是通过英国議會进行的。在美国反抗英国、高举独立革命旗帜的时候，英国議會議決在印度設总督府和最高法院。到了1784年更議決由英王指派六位樞密院人員組織一个总管印度事务的管理局。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的权威已轉移到这个管理局去了。在这以前，代表英国工业资本家利益而提倡自由貿易的經濟理論家亞當·斯密著有“国富論”一書，書中对东印度公司备加批判和打击。在这以后，又值法国拿破崙第一在歐洲大陆封鎖英国貿易，以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不得不加紧把产品傾銷于印度。因此当英东印度公司在1813年向政府請求續給特許狀时，英工业资本家通过議會打破了該公司的商业垄断。从1813年起英国工业资本在印度的势力开始占着上風，而到了印度大起义时在英国就引起了一片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呼声。

許多英国人責备东印度公司，說它的腐化导致印度起义。代表英国貴族地主的利益的巴麦斯頓勳爵，从1830到1855年支持英国的外交政策。当他听到印度

大起义的消息时，他就馬上說东印度公司必須解散④。代表曼徹斯特工業界，主張自由貿易，反对軍事联盟，向来批評巴麦斯頓外交政策的急进派政治家柯百屯（Richard Cobden, 1804—1855年）也是反对东印度公司的。柯百屯写信給他的朋友阿希活斯曾表示他对該公司的意見。“我們都知道”，信上写着，“东印度公司到亞洲去經營的动机，那就是要爭夺不仅对外国人而且也是对我們其它本国人的 一种 壟断生意”。柯百屯还說：“公司既然不会管理事务，引起土人反对，已無繼續存在的必要。”⑤倫敦一个有权威的报纸，“每日电訊”，也有社論說：“統治印度的責任落在一个小最不名誉的东印度公司的人身上。”⑥

事实上，印度大起义很明显地揭露了东印度公司完全无能而破产的性質。英国工业资本家乘机把該公司解散了。过去，在1853年史坦里子爵在国会的提案通过后，公司的特許狀就沒有再照例展期二十年，只是展期到国会另有決議时为止。嗣后史坦里子爵改称杜別子爵，1858年八月二日他的印度提案又通过了。于是英国王室直接統治印度，而东印度公司就宣告結束⑦。1858年印度提案通过的那天，馬克思就在他的“印度大事記”中写道：“从此印度成为可怕的維多利亞女王帝国的一省了。”⑧馬克思这預言到十九年后果然应驗。因为完全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班杰明·狄斯拉列（即裴根斯非尔特伯爵）到1868年才繼任杜別子爵为首相。从那时起英国內閣人物中十八世紀出生的已絕迹，而十九世紀出生的开始露头角。1872年狄斯拉列在曼徹斯特公开主張訂立殖民地宪法以巩固英帝国的力量。在他建議由英国政府收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那年，1875年，他向国会提出議案，要把女王称为印度皇后⑨。第二年这議案通过了；到第三年，1877年，維多利亞才公布为印度的皇后。

① “列宁文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7頁。

② James Mill,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1858, p. 105.

③ Brooks Adams,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p. 263—264; 259—260.

④ “Greville Diary”, edited by Philip Witwell Wilson, Vol. 2, p. 563.

⑤ J. Morley, “Life of Cobden”, Vol. 2, p. 205.

⑥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Oct. 7, 1857.

⑦ 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結局”，譯載“新建設”1953年第10期。

⑧ Marx, “Chronological Notes on India”。

⑨ Morton, 前掲書, p. 423.

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参加民权运动的瓊斯，早就窥破曼徹斯特紡織工業家的企圖。他說这些资本家知道，棉花的来源不能全靠北美合众国，因此要倒閉东印度公司而在印度争取这个原料^①。他固然反对东印度公司，但也不赞成王室去替代公司而統治印度。在他所編輯的“人民报”里，他屡次提到这問題。1857年八月一日他写道：“造成印度混乱的責任不能完全放在公司身上；如果把英政府去替代公司而統治印度，势必以一个掠夺者替代另一个掠夺者”。次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又写道：“如果把管理印度事务的权力从公司移交到政府手里，恐怕鬧得还要更坏”。瓊斯所編輯的“人民报”因經費困难而在1858年六月停办了。但他繼續在“倫敦新聞”写文章。他写了很多同情于印度人民的文章。最后一篇登在1858年八月十五日报紙的，就評論了杜別子爵的印度提案。他說：“过去东印度公司曾阻擋了印度和我們輿論之間的联系。現在情勢改变了，关于印度事件的公众輿論应可表达它的力量了。但事实上是否能办到，要看英国的广大人民是否能負起他們應負的責任。”

在印度大起義期間，英国公众輿論和政府印度施行的政策是不对头的。最突出的一个問題就是应当不应当在印度努力宣傳基督教。英国政府宣傳反对法国革命，一向用“保护我們神聖宗教”为托辭的。但在印度却长期实施保护印度教和一切印度旧風俗習慣的政策。东印度公司在财务上和行政上一向支持印度教寺院，公司解散后直到1862年为止也是如此。在1813年以前英美各国傳教士到了印度就被驅逐出境。在印度大起義时期英方招募印兵，偏偏拒絕了数千印度基督教徒入伍^②。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用意，都是为要利用当地旧的封建势力去統治，而不敢开罪于印度教徒。当时印度土邦領袖和英国在印度所訓練的雇佣军队，大多数属印度教。大起義被鎮压后，英国政策开始挑撥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情感，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始終是剝削殖民地，傳教不过是可用、可不用的手段罢了。

印度大起義爆发后，英国资产阶级却鼓動輿論，要使一般人相信，为要在印度傳教而提高印度人民的文化就不得不用武力去鎮压“叛乱”。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写道：“我們應該考虑，我們維持印度的目的是为將来的基督教和将来印度人民的文化而着想的。”^③自称虔誠的基督教徒如夏夫斯伯利伯爵还曾公开地这样說：“印度的叛乱正符合上帝的意旨。英国注定了要傳达他神聖的兒子（基督）的福音而將使几兆人类的文化有所改进。”^④当时在政治上属于急进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贊成用和平政策去促進基督

教在印度的宣傳的。他們要实行文化和經濟的侵略，但反对用武力。代表他們这种意見的是柯百屯。1857年十月十六日柯百屯在他給阿希活斯的信中說：“那些宗教界的人們以为我們如要傳教必須統治印度。最近事实演变應該使人們明白，派遣紅衣者（英兵）去傳教不一定能保証上帝給我們傳教士的福佑。……但在目前鼓動要用兵的气氛下，我深深了解我这种主張是不会令人欣賞的。”^⑤这就說明，英国资产阶级借口要宣傳基督教而鎮压印度人民，和他們过去借口要保护基督教而反对法国革命是一貫的作風。

远在1764年印度兵士第一次举行抗英起義时，英帝国主义就采用恐怖政策去鎮压人民。把三十名印度兵士捆綁在砲口，然后开砲射击，血肉横飞^⑥。在1857年大起義期間，英軍在孟买登陆，看見任何印度人就用刺刀乱戳。德里被攻破时，城內所留下的印度人大部被杀死了。英軍入阿拉哈巴德等城市时，“也举行不分皂白的屠殺”。“印度叛兵常常不經审判就被吊死或被砲轟死”。駐印度西北部的一位軍官，名叫傅利度列克·柯坡，在一个乡村警察派出所一次就槍殺二百三十七人，把印度土兵第二十六縱队全部消灭了。剩下四十五人因为拥挤在一間很小的房內，沒有点名槍斃就活活地被悶死了^⑦。

在康恩坡城內一家富商名納納者，曾收留了二百英国妇女。当英軍进迫城下时，印度人將这些妇女逼进一間房內，全部用刀砍死。次日把屍首拖出来拋入井內。后来英軍攻进康恩坡城，迫使每个将被槍斃或將被吊死的印度人先去洗刷那房內的血迹^⑧。当时英国方面將印度人的暴行誇大宣傳，甚至裴根斯非尔特伯爵（狄斯拉列）也說过：“許多令人憤恨的暴行細節是有意制造出来的。”^⑨泰晤士報曾刊登一个讀者的

① S. Macoby, "English Radicalism", Vol. 2, p. 366.

② J. N. Farquhar, "Modern Religious Movements in India", N.Y., 1919, p. 9-10.

③ "The Times", London, October 7, 1857.

④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2, 1857.

⑤ John Morley, "Life of Cobden", Vol. 2, p. 205.

⑥ H. Mukerjee "India Struggles for Freedom", 2nd ed., Bombay, 1948, P. 48.

⑦ Woodruff, 前掲書, Vol. 1, p. 359, 376, 377. 可參閱 Frederick Cooper, "The Crisis in the Punjab"; Edward Thomps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al".

⑧ Woodruff, 前掲書, Vol. 1, p. 361.

⑨ House of Commons, July 27, 1857.

長函(署名为 Judex), 宣称大部分与印度暴行有关的故事完全是出于假想的①。

反战、反殖民主义的柯百屯居然相信印度傳来的暴行細節, 但他以为这是咎由自取, 不足为怪。他在写給他密友布莱特(John Bright, 1811—1889年)的信中说:“很清楚的, 英国人在印度的許多言行不能使印度人敬爱他們的。英人过去在印度所犯的罪行, 加上最近在那里所表現的殘酷无情的措施, 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 將必回击到我們和我們自己的子孙身上。我讀了英国軍官从印度来的信札, 我很惊奇他們在那里所放的血債。他們屠殺人家好似猎取野兽。”②

当时英国的急进派, 主張自由貿易的人們都反对英軍在印度屠杀。“晨星报”社論反对报复主义、反对德里三日屠城的提議③。“反国教报”也贊成采取“基督教精神的和緩政策”④。但英国地主、貴族和大资产者的代言人沒有不主張报复、要求严办叛乱者, 他們不惜用任何手段去鎮压印度人民。“每日电訊”报說, 惩罚印度的叛乱不可能不从严厉方面設法⑤。倫敦的“晨报”在社論里写道:“每个英国人必須效忠于他的国家, 使印度的那些惨杀英国妇女的謾骂默德和婆罗門魔鬼絕迹于这个世界。”⑥“紐卡賽尔紀事报”原为急进派刊物, 但自轉入帝国主义者柯文(Joseph Cowan)手中后也轉变論調了。它竟批評康宁的“溫和”政策, 而主張不顧一切地对印度人民实施严厉的报复, “我們的报复必須使我們印度的庶民听到德里二字而发抖”⑦。

代表无产阶级立場而加入这个辯論的只有瓊斯。他曾列举倫敦泰晤士报所报道的、英軍在印度的暴行, 然后下結論說:“这就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的标本, 从此人們不必再談什么印度人的殘酷了。”⑧再一次他提到所謂印度人的暴行时, 他指出傳聞誇大的性質, 并說人們只是片面地听了一方面的話。他要英国人記得, 在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中英軍如何殘酷地用印地安人屠杀美国人民。他說印度“叛軍”的行为决不会比英軍的鎮压更为兇惡。“血債是以血来偿还的, 殘暴只能更产生殘暴”⑨。

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早就投降于帝国主义者了。他們似乎想不通为何在印度的基督教徒竟被人杀害。他們听到大起义时的震惊, 据他們自己說, 好像前一时代听到里斯本地震那样。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領袖, 莫列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在1857年曾做过关于“印度危机”的五次演講。他的結論是“我們必須尽力爭取保住印度那样的版圖”⑩。罗特洛, 另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所写的小册子中说:“有了一个快乐而繁榮的印度, 有了薩克遜人

(英国人)的智慧倡导于西方和回教徒或錫克族的忠誠随于东方, 英国足以称无敌于世界了。”⑪过去曾在格萊斯頓內閣中担任要职的格蘭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在这时候也回到保守的路綫。他宣称:

“放弃印度就会使我們开始墮落。保住印度就証明我們还没有退化。”⑫代表非社会主义工人們的观点的报纸, “来諾尔特新聞报”, 也附和帝国主义而贊成保住印度为殖民地。它的社論說:“印度足供英国企業和貿易的一大活动地区, 我們要好好設法保住它, 不可失去維持这个东方乐园的最后一个机会。”⑬

只有瓊斯的意見是代表有覺悟的无产阶级的。印度大起义的消息傳遞到英国时, 他的1851年在獄中所写的詩“印度斯坦造反”又再版了。这个再版的序言中他写道:“太陽固然永远照耀着英帝国, 鮮血也永远不会乾的。”在1857年八月一日的“人民报”他簡略地叙述英人侵略印度的历史。“百年以前作为商人强盜的外国人夺去了印度人的独立。在这百年中无数千万的罪惡出現了。我們的建議是承認印度的独立。”他对印度大起又表示很大的同情。他以为“这次印度起又是世界史上最富于正义、最崇高、最必要的举动。奇怪的不是这許多被压迫的人們起来反抗, 奇怪的倒是他們过去会向外国人低头降服。如果他們中間的王公酋長等不彼此向外來侵略者出賣, 他們就不会失去独立的。这也証明帝王、王公、貴族, 無論在何国或在何时, 都是人民的仇敌”。他还說:“英国工人應該對他們在印度的兄弟們付与同情。印度兄弟們的運動

① “The Times”, London, January 29, 1858.

② J. Morley, “Life of Cobden”, Vol. 2, p. 208.

③ “Morning Star”, Sept. 29, Oct. 5, Oct. 7, 1857.

④ “Nonconformist”, Oct. 6, 1857.

⑤ “The Daily Telegraph”, Oct. 8, 1857.

⑥ “The Morning Post”, Sept. 5, 1857.

⑦ “Newcastle Chronicle”, July 17, Aug. 7, Oct. 23, 1857.

⑧ “People’s Paper”, August 15, 1857.

⑨ “People’s Paper”, Oct. 19, Oct. 31, Nov. 21, 1857.

⑩ F. D. Maurice, “The Indian Crisis: Five Sermons”, London, 1857, p. 10.

⑪ J. M. Ludlow “Thoughts on the Policy of the Crown towards India”, 1859, p. viii.

⑫ “Weekly Despatch”, August 23, 1857.

⑬ “Reynold’s Newspaper”, Oct. 11, 1857.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历史

吴世璜

印度尼西亚是我们的邻邦，自远古以来，中、印两国就发生了接触。考古学家赫尔德森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四方形石斧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是从中国南部沿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而传入印度尼西亚的^①。印度尼西亚的青铜工具和铁工具也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的。卡连弗尔斯在“雅加达博物馆史前展览室说明书”上写道：“公元前数世纪，制造青铜工具的技术，从中国南部（尤其是云南）和印度支那传入印度尼西亚。”^②印度尼西亚史家雅明在“红白旗六千年史”一书中亦指出：“铁器加工的技术从中国南部，经过越南东京而传入印度尼西亚。”^③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以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一步建立了经济联系，彼此之间有巨舶往来，互通有无，并互派使节访问，交流文化，从而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生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不仅有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两国人也有不少互相通婚的。例如，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著名的淡目国王拉登巴达的母亲就是中国人，雅加达市长苏迪罗1956年来我国访问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讲话中就曾提到这件事^④。印度尼西亚政府情报局出版的“今日印度尼西亚”一书中也曾指出：“巨港居民的血液中含有中国人血液的成份。”^⑤我国史书“海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加里曼丹新当“中华人初到彼，所娶妻妾皆獯子（大雅克族）”^⑥。在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时期，荷兰统治

者曾片面规定住在当地的华侨侨生为荷兰属民，这就产生了侨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种不合理的情况长期以来没有解决。1955年四月我国和印度尼西亚缔结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这是和平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的良好范例。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不单符合于侨民的切身利益，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两国邦交的发展，而且对于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1955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着。本文拟对两国人民的友好历史，从下述几个方面作些简略的介绍：

- ① 见赫尔德森：“荷印史前研究”，载“荷印的科学和科学家”，1945年版，第140页。
- ② 卡连弗尔斯：“雅加达博物馆史前展览室说明书”，1934年版，第30页。
- ③ 雅明：“红白旗六千年史”，1954年版，第20页。
- ④ 1956年6月11日雅加达市长苏迪罗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演说。
- ⑤ “今日印度尼西亚”，1950年版，第102页。中译本：“现代的印度尼西亚”，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版，第83页。
- ⑥ 谢清高：“海录”，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3页。

就是你们的运动；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间接胜利”^①。

瓊斯在1857年九月十二日的“人民报”上又写道：“在印度平乱的经费必然出于税捐，税捐必然出于英国工人人们的口袋。英国工人人们出了这笔钱能得到什么好处吗？得到利益的还不是那些贵族和财阀吗？大家试想一下，自从印度属于英国，印度已如何变得贫穷。如果我们以一个独立而友好的国家对待印度，我们在那里的商业早就会发展得很好”。同年十月三日，他在“人民报”又发表一篇长文章，力劝英国工

人们不要捐款救济从印度退回的英国军民。他劝工人们节省他们的钱，留作自己组织政治运动的用费。同年八月一日“人民报”曾报道，有二百英国军官和兵士排队经过罗徹斯特和坎省姆，引起很多观众的注意。因为他们都是在印度服役期满后返国的，尽管政府要发给额外的月费他们也不愿在印度继续打仗。这也很明显地反映了英国工农阶级对印度大起义的态度和意见。

① “people's Paper”, Sept. 5, 1857.